

中东经济转型

土耳其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变

姜明新

摘 要：凯末尔政府曾长期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努力培养和扶植本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但进展缓慢。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走向，土耳其的经济政策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土耳其国家主义从临时性的经济自保措施转向国家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从而造成了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断裂。

关键词：土耳其；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凯末尔时期

作者简介：姜明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6-0029-1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其经济政策长期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调整，即使是在2002年正发党上台之后，埃尔多安政府也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对长期停滞不前的国民经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本文就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经济政策变化试作分析与探讨，这对分析和预测当今的土耳其经济及其政策走向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建国初期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1923~1929）

一战战败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3个基础之上，其一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其二是凯末尔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三是《洛桑和约》的规定。

传统上《协约与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与《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并称《洛桑和约》。

其一，一战战败后国家分崩离析，昔日幅员辽阔、横贯欧亚非、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信仰的超级大帝国仅余安纳托利亚一隅。

其二，国民经济基本上仍是落后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农业经济，并被打上了深深的半殖民地烙印，不多的近代工业悉数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传统手工业基本上归少数民族经营所有。直至奥斯曼帝国终结，土耳其人始终没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当然不拥有可资倚重的民族工业基础，特别是在西方列强长期欺凌下，又连续遭受长达 10 年的战争重创，从而使本就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沉陷危机之中。一战后的土耳其满目疮痍，国困民贫，百废待兴。但是，凯末尔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首先从根本上扭转了奥斯曼帝国的战败国地位，为解决土耳其人及其国家最起码的生存问题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那些在这一进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主义政府及其领袖，有威望，有能力，在国内坚定地推行和实施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从而确保了共和国的政治独立。正因为如此，西方列强对新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基本上持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

其三，《洛桑和约》的签订，从国际法的角度确认了土耳其的基本版图和民族独立。但作为一战战败国，土耳其仍要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海峡地区被定为不设防区，以及将奥斯曼帝国 1916 年制定的关税税率延续至 1928 年年底这两项规定，严重损害了土耳其的领土主权和经济主权。这些限制也是当时仍很弱小的新生土耳其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与国际承认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因此，土耳其建立之初的经济政策不可能脱离它当时所面临的这一客观现实。1923 年 5 月，就在土耳其国民军击败希腊军队之后不久，洛桑和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土耳其政府面对几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在伊兹密尔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经济会议，该会通过了《经济宣言》，为土耳其未来长期内向型的发展道路和政策定下了基调。其要点是：师从西方，在本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立足国内原料建立和发展本国的轻、重工业；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奖掖并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对在国内的外资企业一律实行国有化；实现关税自主；发展金融事业，建立国营银行，对外资吸收和限制并用，但以限制西方垄断资本为主。

《经济宣言》是一份相对激进的纲领性文件，是土耳其经济民族主义的明确表达。一方面，它宣布土耳其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奥斯曼帝国上百年

西化改革的结果，也是凯末尔“唯一文明论”逻辑的合理延伸；另一方面，刚刚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初步胜利的土耳其政府，力图尽快摆脱西方列强长期强加在土耳其民族头上的精神枷锁和经济桎梏，要求实现经济自立、关税自主和金融独立，在此基础上巩固土耳其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从中不难看出，这份宣言包含了此后在土耳其长期实行的国家主义政策倾向。

但是，此时的土耳其是一战战败国，因此即使是在《洛桑和约》签订之后，西方国家依旧虎视眈眈，竭力维护它们在奥斯曼帝国攫取的利益和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凯末尔及其领导的大国民议会政府审时度势，在取消外国人控制的公债管理委员会、收回财政自主权的同时，适时提出了“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主张，以稳定外部环境；对内则执行休养生息政策，着眼国内面临的实际困难，一方面在政策层面极力扶持农业和民族工业，另一方面集中政府不多的财力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具体来看，“三农”问题是这一时期土耳其新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首先，此时的农业是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民占据全国人口的80%以上；其次，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劳力不足，多数农产品产出不及战前半数，国民基本处于半饥饿状态；其三，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大量青壮年农民参军参战，牺牲惨重，革命胜利后，作为新政府的有力支持者，他们渴望新政府能够惠顾农村，帮助他们改变艰辛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在土地和税收方面强烈要求为他们减负。

面对这种情况，土耳其政府于1923年紧急拨款300万里拉帮助农民购置种子和农具以恢复农业生产。土耳其宣布共和之后，为了恢复国家元气，保障民生和实现国民积累，也为了回馈参战农民的部分要求，政府分步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惠农措施和政策，如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推广良种和普及农技知识、立法促进农村手工业发展并培训农村新兵使用农机等（1924年）。在此基础上，废除传统的什一税以减轻农民负担（1925年）；实行局部土改，确立土地私有制（1926年），并将部分国有地（Miri）、无主地（Mewat）和少数民族人口互换后遗留的土地出售或分给农民。此外，政府还大幅降低农产品运费、保障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农民进口农机等。

除农业之外，政府施政的另一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与执政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相适应，其亮点是独立自主，不再假手外国资本。尽管财政拮据，政府仍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0页。

柳克述：《新土耳其》，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45页。原文为300万元左右。

何凤山：《土耳其农村经济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25页。

节衣缩食，竭力筹款，其重点是市政改造和道路建设。前者主要是新首都安卡拉的市政改造和商港士麦拿（伊兹密尔）遭特大火灾后的灾后重建，后者包括建成安卡拉 - 约兹加特的首条土耳其民族铁路。此外，政府还颁令在全国强制兴修公路，通过赎买政策逐步收回外国人拥有的铁路、港口，并制定了到 1928 年全部收回的计划。

工业方面，政府推行的基本上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着力培养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虽然《经济宣言》敦促政府发展现代工业，但当时土耳其仍停留在手工业时代，加上政府财力有限、人才匮乏，投资现代工业也是有心无力。因此，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的工业政策主要是立法引导、鼓励私人兴办工商企业，甚至规定政府采购不论价格高低必须购买国货，而对在土的外资企业则实行赎买政策。在此期间政府仅有的重大投资项目是建立了 2 家大型国营糖厂和 2 家银行，其中 2 家糖厂设计的年生产能力共 8000 吨，是必需的民生工程；2 家银行中，一是 1924 年 8 月创办的由国家控股的企业银行，主要管理经营全国制糖业，另一是 1925 年 4 月创办的国有土耳其工业与矿业银行，主管全国工矿业。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土耳其农业逐步恢复到战前水平，除部分商品如面粉、小麦尚需进口外，基本实现自给，综合国力稳步回升，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政府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工商的政策，其收效甚微，民生必需的大量商品如布匹、药品等仍依赖进口。其主要原因是关税不能自主，无法给予本国的工商业以可靠保护，更重要的是传统上土耳其人就耻于工商，也缺少兴办工商实业的经验，因此私人资本宁肯去放高利贷，也不愿投资实业，而传统上经营工商业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又因人口流动而流失国外，这些因素给土耳其的工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工业发展必须另辟蹊径。

二、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政策（1929~1938）

凯末尔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按其本人的定义是“经济由国家来控制”，这一政策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1929 年全面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正式出台，让凯末尔一改以前在国内

柳克述：《新土耳其》，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346 页。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 页。

黄维民：《凯末尔与国家主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实行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临时性特征，属应激性的经济政策调整；第二阶段是在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土耳其政府有意识地实施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其标志是制订并实施了具有苏联影响色彩的五年计划。

1、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1929~1932）

1929年1月1日，土耳其收回了关税自主权，立即将进口关税从5~12%提高到40%，以保护本国的农业和初低级工业。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土耳其政府努力与西方修好关系，并在1928年7月就偿还奥斯曼帝国巨额旧债一事达成协议，希望借此获得西方的贷款和帮助。但由于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政府依旧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因而事与愿违，土耳其财政还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偿债负担。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将逐步恢复中的土耳其经济重新推向了深渊。为了摆脱货币贬值和经济危机，凯末尔及时推出国家主义政策，果断中止偿付奥斯曼帝国旧债，严控进口，实行外汇管制，并成立银行团保护持续贬值的里拉，以确保国家金融稳定。

此时凯末尔提出的这一举措，对正在力图恢复的土耳其国际信誉是个沉重的打击，但当时的总理伊诺努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解说，认为这“首先应视作是防卫措施”，为的是“使国家得到安全，最要紧的是使经济免于崩溃”。因此，这一政策最初是一种临时性的、不得已才推出的国家应激举措，其后才通过有意识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逐步成形。这从土耳其政府当时紧急推出的主要措施上就可略见一斑：如加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力度，实行关税壁垒和进口配额管理，严控外汇，限制外国投资等，其目的是加强国家对工业和对外贸易的控制，稳定经济，从而巩固国家独立。

这一政策的推出与当时国际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一致。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出贸易保护措施保护本国市场，一方面千方百计向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因此，为了避免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冲击土耳其国内市场、恶化土耳其的国际收支，凯末尔政府及时调整了产业政策，其重点是农业、金融和外贸。

首先调整的是农业。建国后在政府的重农惠农政策下，土耳其粮食产量稳步上升，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国内粮价暴跌，土耳其国内各种农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73、115页。

[苏]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88页。

[土]伊斯麦特·伊诺努：《1971年议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兆钧所著的《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产品的价格大约下跌了一半，出口不畅，农产品库存堆积，农民增产不增收。面对严峻形势，土耳其政府全力救助农业，主要措施包括：实施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对国内主要农产品小麦实施价格保护；对农产品的收购、出口由国库拨款进行补贴；最初责成农业银行负责，随后成立农产品管理局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以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

危机发生后，政府政策调整的重点是金融领域。在稳住阵脚之后，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金融的控制权迅速、稳步地转移到国家手中。1930 年 2 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稳定土耳其货币价格法》，授权政府干预汇率；3 月成立外汇管理局，以稳定汇价；此后经过一系列准备，于 6 月成立了土耳其中央银行，收回了由奥斯曼银行所拥有的各项权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金融自主。奥斯曼银行由英国资本所控制，曾长期作为土耳其的中央银行存在。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过去土耳其的基本产业政策是进口替代，以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为宗旨，因此在独立之后，废除了治外法权的土耳其政府在极力扶持本国工商业的同时，强化了对外商的征税监管力度，让土耳其市场成为不法外商的畏途。1929 年收回关税自主权后，进口替代政策在新颁发的税法中得以进一步明确：凡是本国能够制造的商品一律禁止或限制进口，本国还不能制造的要征收 50% 的高关税，本国不能制造但属急需的予以免税。危机爆发后，鉴于外贸年年逆差且消费品进口占土耳其进口总额的一半，土耳其政府严控进口，次年土耳其外贸一举扭转了长年逆差的顽症。1932 年土耳其政府进一步设立了对外贸易管理局，建立起对外贸易清算制度，对贸易对象国实施配额管理。所有这些措施都为土耳其顺利渡过危机创造了条件。

总体上看，受全球经济危机的拖累，这一时期，土耳其国民经济仍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但经过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危机期间土耳其经济运行大体平稳，充分展现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初步显现了国家主义政策的强大威力，这为伊诺努政府随后制订和推动大规模实施国家主义政策奠定了基础。引人注目的是，危机期间，政府不仅从战略高度继续投资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危机过后，政府还能集中财力对在土的全部外资企业迅速实施国有化，这对于土耳其来说，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2、中央计划经济的形成和实施（1933~1938）

危机期间，有感于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快速发展以及建国后土耳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9、119 页。

柳克述：《新土耳其》，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347 页。

详情参阅杨兆钧所著的《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5~146 页。

其工业发展的缓慢艰难，从 1930 年起，伊诺努政府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着手起草了土耳其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土耳其正式进入了国家主义主导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推行的总的经济政策是，在保持惠农政策的前提下，在工矿业领域全面推进国家五年发展计划，依托国内资源，兴建国营企业，重点发展消费品生产，以便实质性地推进进口替代，同时减少进口以平衡外贸。

从中不难看出，尽管土耳其于 30 年代推行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师从苏联，但并没有照搬照套苏联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而发展出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建立在土耳其领导人对本国国情的了解以及对他们所追求的政策目标的清醒认识之上，在初期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试验性质。

其一，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也是土耳其过去一直想做却又没做到的。鉴于土耳其消费品对外依存度高，而本国消费品生产能力低下，加上严控进口造成了国内商品短缺这一尴尬局面，土耳其政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发展了本国消费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其期望实现的首要目标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以从根本上消解进口依赖给国家造成的对外支付压力和金融震荡。

其二，国家主义政策实施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工矿领域。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一些薄弱的工业部门，尤其是轻工业领域，而不包括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业部门，即国家不在农业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其三，国家主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银行。这也是土耳其的一大特色，政府计划，企业运作。在五年计划获得大国民议会审议通过后，其工业发展计划交由土耳其工业与矿业银行具体负责实施和经营管理。

其四，实施国家主义政策是土耳其政府调和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作用的产物。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争在土耳其由来已久，土耳其的《经济宣言》曾建议政府投资兴办企业，但总体来看，与一战后国际主流观念一致，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土耳其长期占上风。然而事实证明，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土耳其极力培养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缓慢，与苏联模式的快速工业化形成鲜明对比，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 30 年代险恶的国际环境则成了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催生素。但此时自由主义思想在共和人民党内与政府内部仍很强大，这就是 1933~193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议会通过后延期变成 1934~1938 年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终共和人民党内与政府内部均达成一致，在不打击、损害私人资本积极性的前提下推进国家主义。尽管如此，这两种观念间的争斗在土耳其的历史上也只是暂告一段落，远没有因此结束。

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大国民议会通过后，经过延宕和 1933 年土耳其工业与

矿业银行的改组拆分，于 1934 年由苏麦尔银行（主管工业）和埃提银行（主管矿业）付诸实施。这第一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可以分为以下几大部分：

一是投资兴建国营企业。主要投资领域是纺织、食品、造纸、玻璃、陶瓷、水泥、钢铁、化工等，其规划和投资设厂的主要原则是：（1）依托本国原料进行产业投资，本国暂无原料但又急需的，限期解决原料问题。这一方面着眼于本国原料的市场出路和内部市场统一，另一方面是要着力推动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替代；（2）注意工业合理布局，力求就近生产，旨在减少运输成本和困难，同时解决产地附近农民的就业以及地区平衡等社会发展问题。

尽管国家投资门类较多，但土耳其“一五”期间建设的重点是纺织工业，如棉纺厂、毛纺厂、丝纺厂、化纤厂等。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自奥斯曼帝国晚期起，纺织品一直是土耳其进口的大项，也是土耳其外贸逆差的主要项目。纺织业也因此成为当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从此迅速发展起来，时至今日，已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和出口大户。在规划和兴建纺织工业时，土耳其开创了利用外援和外资的先河。1932 年伊诺努总理访问苏联时，获得了 800 万美元的专项工业无息贷款，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土耳其在开塞利和纳济利投资兴建了两座现代化的棉纺厂。这是继 1930 年从美国获得贷款后，土耳其政府获得的又一笔外国贷款，并且在项目的论证、规划、筹办和技术上获得了苏联的帮助。

二是赎买国内外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土耳其政府手中有了比较可观的外汇储备，并且在“一五”中期以后，随着国力提升，土耳其通过向英法贷款，赎回了外资拥有和经营的公用事业和铁路。在度过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土政府再度集中财力，通过赎买方式向外国公司推行国有化。这次国有化主要集中在供水、电力、公交、煤气等公用事业和铁路、矿业等行业。至二战爆发前，土耳其已将境内全部外资产业收归国有。

三是继续推进交通运输建设。修建、赎回铁路、巩固国防是土耳其政府长期坚持的一项国策。“一五”时期，土耳其政府多方筹措资金，包括发行内债和对外借款，在分阶段赎回外资铁路的同时，集中财力和物力，加快了铁路建设。在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也投资航运业，并将外资拥有的港口、码头悉数收归国有。

3、国家主义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引发的争议

[苏]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88~289 页。

同上，第 294 页。

实施国家主义政策后，土耳其不仅相对平稳地度过了全球经济危机，其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一五”计划的实施，则一改土耳其独立以后工业发展的疲弱状态，迅速发展了起来。到1937年提前完成全部计划，既为土耳其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为土耳其的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土耳其与苏联和日本一起，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三个国家，举世瞩目。

虽然直到1940年土耳其农业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7%，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在1930~1940年间，土耳其工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1.4%上升到了18.9%，制造业产值增长了近5倍，其中纺织业发展最快，增长了22倍多，国产纺织品已能满足国内需求的80%；在矿业方面，煤炭产量翻了近一番，铬产量增长了6倍，钢铁生产几乎是从无到有，仅卡腊比克钢煤联合公司1940年的产量就达到了13万吨，矿产值从1930年的3930万里拉增长到1940年的7160万里拉；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铁路、公路里程接近翻番；在国家财政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土耳其的税收迅速增长，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了近6倍。

由于事前经过周密的调研和规划，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得非常顺利，因此，从1935年开始，土耳其政府就逐步开始将国家主义政策扩展到了航运业等经济部门。随着国力的大幅提升，1936年土耳其政府在蒙特勒会议上获得成功，一举收回了海峡的主权，取得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外交胜利。乘此东风，大国民议会于9月批准了更加雄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但就在国家主义政策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该政策在土耳其朝野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首先，由于有强大的国家资本大规模参与经济生活，参与市场竞争，私人资本的成长空间日益减小，引起私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家的不满。建国后，虽然国家颁布《鼓励工业法》努力促进私人资本的发展，私人资本尤其是不少农村资本也确实积极向政府鼓励的方向转移，但到30年代土耳其的私人资本力量仍旧十分弱小，无论资金、技术，还是对市场、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无法与国家资本相提并论，更谈不上平等竞争。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国家资本大规模地进入，就对私人资本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备受挤压，从而直接损害了民族资本家的切身利益。例如，在对外资进行国有化期间，不少民族资本包括私人所有的公用事业和矿山也被一起国有化了，在某些行业形成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的局面，因此招到了民间资本的强烈反对。

其次，国家资本逐步“托拉斯化”，导致市场垄断，造成事实上的与民争利，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49、161、164页。

甚至是攘民夺利，从而引致更多中小企业主的不满。这种情况与土耳其国家资本的运作特点有关，对土耳其国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主体是专门银行。这种银行所代表的国家金融资本与下辖企业形成一个集金融、工业、商贸于一体的庞大托拉斯，垄断了诸多产业和行业，控制了市场价格，形成对私人资本的绝对优势。这点在苏麦尔银行、埃提银行和海运银行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统计，“到 30 年代末期，土耳其全国铁产品的 100%、钢铁产品的 80%，人造丝产品的 35%，水泥产品的 55%，均被苏麦尔银行所控制。而埃提银行则控制了土耳其全部的煤炭和铜矿生产以及一半以上的铬矿与硫磺矿的生产。”1937 年，大国民议会甚至还通过了第 3295 号法令，将海运业全部收归国营，而仅仅在十年之前，政府还极力鼓励民族资本进入航运业，以打破外国资本的垄断。

这种状况在共和人民党内和政府内部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并且日趋尖锐和公开化。当时，伊诺努总理推崇国家主义，特别青睐苏联的快速工业化模式，认为在当时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土耳其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才能保障国家安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国家主义别无更为有效的办法。国父凯末尔虽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同意和支持伊诺努总理的国家主义政策及其现实性理由，并在 1931 年将国家主义纳入其 6 项“基本不可改变的原则”，但他本人坚信英法等国实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到了“一五”后期，他认为，眼前这一国家主义政策与共和国成立后着力扶植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不符。1937 年 2 月凯末尔主义入宪之时，共和人民党以第 3135 号法令的形式对国家主义原则做出限定：“在经济和制造业领域里，在私人投资感到困难时，则以国家经营的形式及更大力量来从事。即在允许私人资本经营的同时，凡关系到公共生活及国家的和更高的利益所及的行业，则由国家经营之。”这一立法明确给出了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只有在私人资本力有不逮或为了“更高利益”的情况下，国家资本才可以介入。由于两人政见分歧，在多方压力下，伊诺努总理被迫辞职，由前经济部长、土耳其企业银行董事长杰拉勒·拜亚尔接任，对国家主义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恢复自由经济。但是，1938 年 11 月凯末尔辞世后，伊诺努当选了共和国总统，他把土耳其重新引入了国家主义时代，当然这是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另一个时代。

Berch Berberoglu, *Turkey in Crisis: From State Capitalism to Neocolonialism*, Zed, 1982, p43.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北京：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153、159 页。

同上，第 107~108 页。

三、结论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政府曾在国内长期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极力培养和扶植本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但结果与凯末尔等领导人的预期相反，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土耳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十分缓慢。但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走向，土耳其的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土耳其国家主义从临时性的经济自保措施转向国家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从而造成了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断裂。

但是，由实施国家主义政策所产生的弊端，如国家资本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引起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凯末尔的警觉，从而让土耳其的国家经济政策开始了向自由主义的调整和回归，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起以自由经济为主、以国营经济为辅的经济发展原则。这一调整和回归，后因凯末尔的辞世而中断，而此时由于战争的阴影日趋逼近，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土耳其重新选择了国家领导人及其国家主义政策，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加强国家控制，直到二战结束。

通过以上对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经济政策的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凯末尔时期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早期从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还是后期向自由主义短暂回归，都是土耳其领导人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凯末尔国家主义的大规模实施，是土耳其领导人在取得国内政治稳定之后应对外部挑战的政治抉择。在当时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独立后仍很孱弱的土耳其国家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危机关头，凯末尔凭借他在土耳其国内外所拥有的巨大声望，为土耳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一方面得益于人民的拥护和凯末尔对经济政策作出的政治决断在土耳其国内具有难以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凯末尔革命胜利后确立和培育起来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在对抗外部危机和风险时起到了同舟共济的社会动员作用，形成了凯末尔实施国家主义政策的有利条件。

凯末尔的远见卓识清楚地体现在其后期经济政策向自由主义的回归上，他没有满足于早期实施国家主义政策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在实施中期就敏锐地发现了国家主义政策的局限性，其后期的决策不仅摆脱了并且还超越了他所曾经代表的军人利益集团的束缚，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土耳其的未来发展为目标，这是凯末尔留给后人的一份重要遗产，也是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凯末尔及其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总有很多相似之处,进入 21 世纪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把土耳其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恢复了过来,取得了连续 12 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傲人业绩。2013 年,美联储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重新引发全球金融震荡,经过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土耳其经济遭此风险,于 2014 年出现了令人忧心的经济下滑。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迅速抬头,导致政局不稳,游行示威骚乱不断。然而在 2014 年 8 月举行的土耳其首届总统直选中,土耳其人民最终还是选择了埃尔多安,他也因此成为土耳其首任全民直选总统。面对 2013 年以来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土耳其面临的经济困难,埃尔多安将再次做出艰难的经济政策选择,是继续坚持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还是引入国家主义的政策手段对土耳其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值得关注。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urkey's Economic Policies: from Liberalism to Etatism

JIANG Mingxin

(Jiang Mingxin, associate Researcher, Ph.D., the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AS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The laissez-faire economic policies have long been enforced in Turkey by the Kemal government for the purpose to cultivate and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and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but the erup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 1929 has changed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from the classic Liberalism to the Etat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with the official Soviet assistance, the Turkish government has transformed consciously its economic policies from the provisional self-protection measures to that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thus interrupt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Turkey.

Key Words Liberalism, Etatism, Economic Policies, Kemal's Turkey

(责任编辑:钱学文)